

乾隆皇帝的荷包

赖惠敏 著

中华书局

乾隆皇帝的荷包

赖惠敏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的荷包/赖惠敏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1
ISBN 978-7-101-11303-7

I.乾… II.赖… III.财政史-研究-中国-乾隆(1736~1795) IV.F812.9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926号

-
- 书 名 乾隆皇帝的荷包
著 者 赖惠敏
责任编辑 潘 鸣
封面题签 李天飞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
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940×1260毫米 1/32
印张15 插页2 字数400千字
印 数 1-5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303-7
定 价 58.00元
-



赖惠敏 1956年生，台湾台中市人。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、博士。现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学术专长为清代家族史、社会经济史。

著有《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》（1983）、《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》（1997）、《续修澎湖县志·财政篇》（2005）、《但问旗民：清代的法律与社会》（2007）、《清代的皇权与世家》（2010）等专著，并发表论文数十篇。

目 录

导 论 / 1

上篇 皇帝的金库

第一章 内务府的官庄 / 33

- 一、前言 / 33
- 二、内务府官庄 / 36
- 三、官庄的管理 / 52
- 四、官庄的地租与变化 / 63
- 五、内务府庄头制度的崩溃 / 71
- 六、结论 / 85

第二章 税关与皇室财政 / 89

- 一、前言 / 89
- 二、关税盈余与皇室收入 / 92
- 三、新增之关税项目与皇室收入 / 102
- 四、税关监督与罚俸、查抄家产 / 115
- 五、税关变卖内务府的物资 / 126
- 六、结论 / 135

第三章 内务府的当铺与生息银两 / 138

- 一、前言 / 138
- 二、当铺的资金来源 / 140
- 三、内务府当铺之经营 / 147
- 四、内帑与商人 / 155
- 五、生息银两与商人的负担 / 172
- 六、结论 / 178

第四章 盐务与皇室财政 / 180

- 一、前言 / 180
- 二、盐政衙门与皇室收入 / 183
- 三、盐商与皇室收入 / 199
- 四、结论 / 217

下篇 皇帝的功德

第五章 乾隆朝修建北京的藏传佛寺 / 223

- 一、前言 / 223
- 二、清代北京修建藏传佛寺的经费来源 / 228
- 三、清初北京官修建的藏传佛寺 / 231
- 四、乾隆朝修建的藏传佛寺 / 234
- 五、结论 / 254

第六章 北京寺庙的功能 / 262

- 一、前言 / 262
- 二、北京藏传佛寺的宗教活动 / 269
- 三、喀尔喀蒙古王公朝觐活动 / 274

- 四、北京内城的庙会 / 286
- 五、清政府对北京庙会空间的控制 / 297
- 六、结论 / 304

第七章 乾隆朝修建的热河藏传佛寺 / 311

- 一、前言 / 311
- 二、兴建热河佛寺的经费来源 / 314
- 三、热河修建的藏传佛寺 / 322
- 四、热河地区的喇嘛与钱粮 / 342
- 五、热河藏传佛寺的支出及其意义 / 346
- 六、结论 / 354

第八章 藏传佛寺的寺院经济 / 357

- 一、前言 / 357
- 二、来自中央户部的经费 / 358
- 三、来自内务府的经费 / 363
- 四、州县支付的喇嘛钱粮 / 381
- 五、蒙古各旗摊派银两及牧厂地租等 / 389
- 六、清朝供养喇嘛的经济意义 / 395
- 七、结论 / 405

结 论 / 408

后 记 / 415

参考书目 / 420

索 引 / 452

简体版后记 / 471

图表目次

- 图 1—1 乾隆年间内务府官庄的地租收入 / 66
- 图 2—1 各项关税解交内务府银两数额 / 125
- 图 2—2 乾隆朝人参变卖所得银两数 / 127
- 图 2—3 内务府变卖各项物资总价 / 136
- 图 2—4 户部与内务府在税关收入之比较 / 136
- 图 4—1 两淮盐政解交内务府占盐政衙门总经费比例 / 195
- 图 4—2 盐政办公节省银等 / 199
- 图 4—3 商捐所占的比重 / 201
- 图 4—4 两淮盐商缴交提引余利 / 208
- 图 4—5 长芦盐商借内帑之利息 / 208
- 图 4—6 乾隆时期盐政总收入 / 219
- 图 5—1 乾隆皇帝的佛装像 / 224
- 图 5—2 喇嘛的度牒 / 226
- 图 5—3 须弥灵境图 / 247
- 图 5—4 排云殿、佛香阁建筑 / 248

图 5—5 宝云阁 / 250

图 5—6 宝云阁旁边的晒佛场 / 252

图 5—7 乾隆年间内务府支出修建北京藏传寺庙的经费 / 253

附录 5—2 清代北京藏传佛寺空间分布图 / 258

附录 5—3 清代北京城城北藏传佛寺空间分布图 / 259

附录 5—4 清代北京朝阳门外藏传佛寺分布图 / 260

附录 5—5 清代北京西郊藏传佛寺分布图 / 261

图 7—1 广储司银库和养心殿造办处的总收支(1745—1795) / 315

图 7—2 溥仁寺慈云普荫殿 / 322

图 7—3 溥仁寺三世佛 / 324

图 7—4 普宁寺大乘之阁 / 326

图 7—5 安远庙 / 328

图 7—6 安远庙壁画 / 329

图 7—7 普乐寺上乐王佛 / 330

图 7—8 磬锤峰 / 331

图 7—9 普乐寺 / 331

图 7—10 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 / 334

图 7—11 普陀宗乘之庙群楼 / 335

图 7—12 罗汉堂之罗汉 / 337

图 7—13 殊像寺 / 339

图 7—14 须弥福寿之庙,万寿琉璃塔 / 340

图 7—15 乾隆年间皇帝巡幸热河支出 / 348

图 7—16 热河遗迹配置图 / 356

图 8—1 乾隆皇帝供养喇嘛的支出图 / 364

附录 8—1 清代官管藏传佛寺分布图 / 407

- 表 1—1 乾隆朝内务府官庄的数量、人丁、土地面积 / 38
- 表 1—2 盛京内务府所属庄头等折交分地亩银两数目 / 41
- 表 1—3 承安地亩坐落、数目 / 49
- 表 1—4 查抄官员名单与土地面积 / 50
- 表 1—5 天津府青县革退庄头欠租 / 74
- 表 1—6 河间府任邱县革退庄头欠租 / 75
- 表 1—7 蓟州代征革退庄头租银 / 76
- 表 1—8 天津府沧州代征革退庄头租银 / 77
- 表 1—9 清乾隆朝的银钱比价 / 86
-
- 表 2—1 各关各年解交内务府盈余数 / 97
- 表 2—2 乾隆六年(1741)织造局经费 / 101
- 表 2—3 各税关缴交养心殿造办处之税额 / 114
- 表 2—4 税关监督缴交内务府各项银两 / 122
- 表 2—5 乾隆四十三年人参价格变化 / 128
- 表 2—6 康熙、乾隆朝人参价格变化 / 130
- 表 2—7 税关变价玉石的银两数 / 132
-
- 表 3—1 乾隆十四年(1749)八旗兵丁归还本银 / 141
- 表 3—2 内务府当铺的本银生息 / 153
- 表 3—3 康熙三十七年(1698)内务府商人与息银数目 / 157
- 表 3—4 王至德拟摊还本利银两 / 161
- 表 3—5 范氏之盐引与估价 / 168
-
- 表 4—1 两淮盐政衙门办公费用及节省银 / 188
- 表 4—2 乾隆朝历年的商捐 / 200
- 表 4—3 两淮盐商缴交历年盐引余利银 / 206

- 表 4—4 两淮盐商缴交盐引余利银 / 207
- 表 4—5 商人借银之利息 / 212
- 表 5—1 内务府银库之归本余利银 / 231
- 表 5—2 建造大西天诸建筑用银 / 238
- 附录 5—1 北京喇嘛各寺庙坐落地址表 / 256
- 表 6—1 北平庙会调查统计 / 295
- 附录 6—1 1766—1838 年喀尔喀蒙古王公、喇嘛等
进贡项目与数量 / 306
- 附录 6—2 康熙六十一年(1722)议准喀尔喀蒙古王公廩给数量 / 309
- 表 7—1 热河道库存银两的来源 / 317
- 表 7—2 两淮盐政购进黄金数量 / 319
- 表 7—3 热河道库存银 / 320
- 表 7—4 罗汉堂修建费用 / 336
- 表 7—5 热河庄头人数与纳粮数 / 352
- 表 8—1 喇嘛人数与钱粮 / 359
- 表 8—2 喇嘛的菜蔬银 / 367
- 表 8—3 雍和宫唵经与制作巴苓 / 368
- 表 8—4 北京藏传寺庙每月的香供、素菜银两表 / 370
- 表 8—5 藏传寺庙喇嘛唵经日期与人数 / 373
- 表 8—6 弘仁寺放乌卜藏之物品 / 375
- 表 8—7 雍和宫地亩与租银两表 / 376
- 表 8—8 雍和宫香灯银支用途 / 379
- 表 8—9 热河喇嘛赏银 / 381

- 表 8—10 嘉庆十六年(1811)盛京藏传佛寺的喇嘛口粮 / 383
- 表 8—11 《蒙藏佛教史》记载的喇嘛数 / 384
- 表 8—12 多伦诺尔汇宗等寺的喇嘛口粮 / 386
- 表 8—13 乾隆二十六年(1761)甘肃地区喇嘛口粮表 / 388
- 表 8—14 蒙古盟旗支出班第银两 / 390
- 表 8—15 甘肃地区的驻京喇嘛名号及寺庙位置 / 401

导 论

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,田赋就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项目。清代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地,除土地税外,又增加丁银、耗羨、漕米等;另外,工商业税方面的税源有盐税、关税、杂赋等。根据王业键教授的统计,乾隆十八年(1753)清朝国家税收达107,310,000两。^①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、兵饷、驿站经费、教育经费、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。^②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,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。^③乾隆年间,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,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,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。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,并将皇室资

① Yeh-chien Wang, *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, 1750 - 1911* (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3), p.72.关于各项收入及占岁入总数的比例,乾隆三十一年(1766)为地丁银61.62%、耗羨6.18%、盐课11.83%、关税11.13%、常例捐输6.18%,其他杂赋等为3.1%。参见史志宏、徐毅,《晚清财政:1851—1894》(上海: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,2008),页49。

② 汤象龙,《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》,《财经科学》,1957年第1期,页49—83。

③ 参见陈锋,《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》(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8),第二章“学术史回顾:20世纪的清代财政研究”,页16—93。

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。再者,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,动辄百万两,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。至于皇室的开销有: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;赏赐、筵宴;节日庆典如皇太后、皇帝万寿、皇帝大婚等;修缮宫殿、苑囿、寺庙、陵寝;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、六次南巡、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。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“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”。^① 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,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。

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,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,经济上大规模扩张,出现集约化的耕种、农村经济商业化、经济作物专业化、引进新的农作物、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。^② 韩书瑞教授(Susan Naquin)与罗友枝教授(Evelyn S. Rawski)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,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。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,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。^③ 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,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,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。另外,中国扩大对外贸易,关税收入随之增长。实际上是否如此,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。

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,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。譬如伊懋可教授(Mark Elvin)所谓的“高度均衡的陷阱”(the high-level equilibrium trap),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,而人口却节节成长,加上资本无突破,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。在商业方面,何炳棣教授的《扬州盐商》则是一篇典范之作。何教授讨论十八

① 汤象龙,《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》,《财经科学》,1957年第1期,页49—83。

② Ping-ti Ho, *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-1953* (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)。

③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S. Rawski, *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*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87), pp. 102-106, 143。

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,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,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。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,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: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、均分家产制度、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。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(1738—1804),两淮盐商捐献了36,370,968两;乾隆三十三年(1768)他们花费4,670,000两招待皇帝南巡;1763年以后,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。^①此外,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、修祠堂、置祭田,或捐钱办善事、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,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,扩大生产营运,而走上衰败之途。^②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*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: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 1368-1911*,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,嗜好射箭及斗蟋蟀,并建了一座名园“康山园”。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、艺术家及鉴赏家,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,终致家道消乏。^③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?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,试图做些回应。

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,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、政治与镇压的力量。道格拉斯·C·诺斯(Douglass C. North)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,他认为人口、科技、意识型

① 何炳棣著,巫仁恕译,《扬州盐商: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研究》,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,1999年第2期,页59—76。

② 徐泓,《盐价、银钱比价:清代两淮盐商的成本、利润及其没落的原因》,收入陈捷先、成崇德、李纪祥主编,《清史论集》(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6),下册,页642—659。本书讨论盐商没落的原因,相关研究有王思治、金成基,《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,1981年第2期;张连生,《清代扬州盐商衰败原因综述》,《盐业史研究》,1986年第1辑,页81—84;朱义成,《清中叶盐商没落的原因及影响》,《盐业史研究》,1991年第1期,页28—31。

③ Ping-ti Ho, *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: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, 1368-1911* (New York: John Wiley and Sons Press, 1964), pp. 287-289. 此书已有中译本,何炳棣著,徐泓教授译注,《明清社会史论》(台北:联经出版公司,2013)。

态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。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,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,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。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,源于“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,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。”^①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,“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,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。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,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。”^②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,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,存在持久的冲突。

诺斯如此定义国家:“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,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。”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,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,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。简单地说,国家用“保护与正义”等服务来交换税收。但是,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,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。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,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。因此,政治环境的竞争力、强制力量的平衡,以及财产权的效率,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。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,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,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。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,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。历史上,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:其一为“竞争性”限制,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,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,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。其二是

① 道格拉斯·诺斯(Douglass C.North)原著,刘瑞华译,《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》(台北:时报文化出版公司,1995),页25。

② 道格拉斯·诺斯(Douglass C.North)原著,刘瑞华译,《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》,页28。

“交易成本”限制,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,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。举例来说,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,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,提高税收,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。根据诺斯的观点,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。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?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,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。然而,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。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,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对手,在这样的情势下,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。“因此,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,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。”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,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,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,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。^① 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,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,存在着冲突。

1993年开始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,当时我做清代皇族的课题,主要阅读宗人府的档案,但皇族的经济来源涉及内务府,因此也阅读《内务府来文·土地房屋类》、《内务府奏销档》等相关档案。清代皇族计划结束后,我开始做内务府的研究。后来认识步德茂教授(Thomas M. Buoye),他曾拜师韦庆远教授,韦先生对内务府档案如数家珍。步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,并展示部分档案。我天生对数字有兴趣,所以2000年申请“国家科学委员会”补助计划,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《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》,自乾隆八年(1743)起至嘉庆二十年(1815)止,共有823件档案,9个

① [美]步德茂(Thomas M. Buoye)著,张世明等译,《过失杀人、市场与道德经济——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利纠纷》(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8)。